经济讲堂

从长周期视角观察国内外经济形势

主讲人：中国社科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　李　扬

核心观点

从经济发展长周期视角观察国内外经济形势，进而作出科学判断，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经济发展的长周期以科学技术的周期性颠覆性变化及相应的产业结构大规模调整为基础，以此视角分析国际形势，可得到“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的重要论断；分析国内形势，可总结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大逻辑。这一理论与创新驱动发展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互通声气，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全球经济形势，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有大量精辟论述，特别是他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的主旨演讲，应该说，这是我们研究国际经济形势和国际经济学的总纲。

“今天，我们也生活在一个矛盾的世界之中。……世界经济长期低迷，贫富差距、南北差距问题更加突出。究其根源，是经济领域三大突出矛盾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世界经济形势的论述，简洁、明朗，一语中的。

话题之一　世界经济三大突出矛盾仍未得到有效解决

- 全球增长动能不足，我们处在新旧动能交替过程中
- 全球经济治理滞后，难以适应世界经济新变化的新需求
- 全球发展失衡，日益增大的分配不公引发社会动荡

第一，全球增长动能不足。具体的体现就是：推动经济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上升的“旧技术”已过度利用，潜力耗尽，其对经济的拉动力已趋式微；而推动下一轮经济增长的技术虽已知悉，或已在相当程度上展示出其巨大影响，但由于尚未进入全面商业化开发利用阶段，尚未全面改造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仍然不能担起支撑经济长期增长的大梁来。简言之，我们正处在一个新旧动能交替的过程之中。

第二，全球经济治理滞后。首要的表现就是，自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国际经济力量对比发生了深刻演变，但全球治理体系并未因应而变。在19至20世纪的200年内，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占全球GDP的份额之比约为2:8。上世纪90年代开始，特别是中国携改革开放之力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之后，200年不变之坚冰始被打破。2008年，新兴经济体对全球GDP贡献率达到50%左右，此后逐年增大。至2014年，新兴经济体占全球GDP的份额也开始与发达经济体平分秋色，目前，前者已接近60%。但这样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并未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得到及时、充分的反映——新兴经济体并未因自己增加了对世界产出的贡献而在全球治理中有了更多的话语权。其次，全球产业布局在不断调整，而贸易和投资规则却未能跟上形势变化。众所周知，科学技术进步、国际分工深化以及跨国公司发展，正不断改变着传统的国家、地域、产业乃至产品的界限，因而，全球的贸易和投资格局始终在调整之中。然而，现行的贸易和投资规则却迟迟不能因应变化，那些基于传统贸易投资格局且充分反映发达经济体利益的规则，正在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造成束缚。所以我们看到，近年来，围绕贸易和投资的国际纠纷有逐渐增多、愈演愈烈之势。再次，危机的延续，要求增强抗风险的能力，但是全球治理机制未能适应新需求。目前，全球仍然处在高风险之中，集中表现为全球债务的不断恶化。据IFF统计，2016年底左右，全球债务已达到创纪录的217万亿美元，较2008年底翻了一番。这一规模已经相当于全球GDP的327%。然而，各国当局对此都讳莫如深。有人比喻说，如今世界对债务的依赖，如同醉汉对喝酒的依赖，每干一杯，醉汉会增加一分欣快，但是，宿醉的痛苦将会在明天显示，并需要很长时间去承受。

第三，全球发展失衡。近年来，全球GDP的蛋糕越做越大，但是经济发展成果的分配却越来越不公，这种不公，既体现在国与国之间，也体现在各国内部的不同阶层和群体之间。更为严重者，日益增大的分配不公已经引发日益增大的社会动荡，而且成为全世界动乱的主要根源。人们不无忧虑地看到：生产效率的提高，固然有增加产出之效，但分配不公问题可能更加恶化。

2017年底，若干国际组织都公布了它们对未来全球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基本的调子就是：全球经济短期稳定可期，但长期增长堪忧。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7年10月份的《世界经济展望》就明确指出，复苏十分脆弱，稳健增长也许并不能持续，许多地区的中期前景不尽如人意。关于未来的政策关注点，IMF强调了三个方面，一是努力提高潜在产出。也就是说，IMF也认为，全球经济的问题出在实体层面，出在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难以提高方面。二是关注收入分配问题，希望全球增加的产出能被更多的人口分享。三是增强抵御下行风险的能力，其中，防范和化解债务风险是重中之重。经合组织（OECD）的《世界经济展望》则从投资角度切入：因为私人部门投资不振，全球仍然受需求不足之困。更严重的是，由于投资不足，人们寄予无限希望的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也无从实现。换言之，需求面的投资不振，反转来会导致供给面的潜在生产率提高不快。如此看来，全球的经济衰退确实十分严重，全世界还须打起精神来应对。

总之，虽已经历了9年的痛苦，全球经济仍未走出危机，恰如其分的判断应该是：全球危机进入了下半场。在这个可能还须耗费再一个十年的“下半场”，需要完成的任务或许更为复杂、更为艰巨：一是要继续消解造成此次百年不遇全球危机的各类问题，特别是实体经济层面的结构性问题，努力促使潜在增长率提高；二是消除危机以来各国当局采取的“超常规”宏观调控政策所带来的副作用；三是将使用更多的政策资源和国民财富，用于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等社会问题；四是面对全球大动荡大调整格局，寻求多重意义的“再平衡”。

再看中国。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分析判断，无论是短期还是中长期，均应以坚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为重点。需要注意的是，新常态所揭示的速度下行，换回来的是更高的质量和效益，以及更可持续的发展环境。简言之，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解读，应当从质量提高、效益增长和可持续性增强方面展开，至于增速趋缓，那实在只是中国经济成长为世界强国过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

话题之二　研究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要关注两个侧面

- 关注经济的实体面，尤其要关注潜在增长率及其动态
- 关注经济的金融面，要关注金融风险尤其是杠杆率问题

研究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特别需要关注两个侧面：一是经济的实体面，尤其要关注潜在增长率及其动态；二是经济的金融面，特别需要关注金融风险尤其是杠杆率问题。

论及经济增长的中长期趋势，当然少不了对潜在增长率的估计。近年来，很多研究机构都在估算我国的潜在增长率，结果也大致相仿。有经济学家在党的十九大之后，根据到本世纪中叶新两步走的战略，估算了到2050年我国的潜在增长率。这项研究有两点值得关注，其一，从目前到本世纪中叶，我国潜在增长率在趋势上是下行的；其二，到2050年，我国潜在增长率仍将保持在接近3%的水平，如果加上2%的物价上涨，则名义增长率依然能接近5%。应当说，这是一个令我们自豪和充满信心的结果。令人自豪的是，这一水平，不仅高于近几十年来发达经济体的平均增长率，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令人有信心的是，照此发展，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可以实现。

金融面的情况比较复杂。首先应当了解金融和实体经济相辅相成、互联互生的关系。一般而言，实体经济在某一水平之上呈向上增长之势时，金融的扩张与之保持着增函数的关系，就是说，金融业的扩张速度将高于实体经济的增长速度，如同我国2009年之前30余年那样，相对于经济年均9.8%左右的增速，金融业的总资产年均增长20%以上。反之，在实体经济呈下行趋势时，金融业与之保持着减函数的关系，就是说，金融业的发展速度开始下行，且比实体经济萎缩得快。问题的复杂之处在于，基于资产负债表机制，金融业规模的相对萎缩，同时意味着资产面的不良资产增多和负债面的债务凸显，进而，金融杠杆率将不断攀升。可以说，“金融风险的源头在高杠杆”。自然地，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宏观经济管理的主要任务是“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

值得欣慰的是，自从2015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三去一降一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任务以来，去杠杆已经成为我国金融业的中心工作。经过艰苦的努力，如今我国的杠杆率增速已经趋缓。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的跟踪研究显示，2017年前三季度，我国杠杆率出现两大变化：宏观上，实体经济总杠杆率趋稳，杠杆率由一季度的237.5%提升到二季度的238.2%和三季度的239.0%，三季累计微升1.5个百分点；结构上，由于杠杆发生了由企业向居民和政府的转移，我国杠杆率风险有所降低。具体而言，居民杠杆率由46.1%上升到二季度的47.4%和三季度的48.6%，累计上升了2.5个百分点；企业杠杆率从157.7%下降到二季度的156.3%和三季度的154.8%，累计下降了2.9个百分点，但其中国企去杠杆收效甚微；政府总杠杆率从一季度的37.7%上升到二季度的37.8%和三季度的38.1%，累计微升0.4个百分点，总体风险依然较低。其中，地方政府杠杆率持平，止住了飙升势头。显然，如果这一势头能够保持，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便有了把握。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未来发展中，我们的主要任务有三：一是推动经济优化升级、创新驱动、绿色发展，由此稳步提高效率、提高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抓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各项工作，不断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真正做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不能掉队”。三是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其中，特别需要从去杠杆入手，管理好金融风险，为实体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金融条件。

学者观点

张军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六大特征

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坚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立足大局，把握规律。面对新时代新要求，如何更好地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近日表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的基础上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它不仅高度概括了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趋势性特征，清楚地回应了近年来有关我国经济形势变化的种种疑虑，也为我国新时代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根本指导。

分析起来，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及治理蕴含六个方面的重要特征：一是潜在增速降低但仍然具有中高速增长潜力。二是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从数量扩张转为质量提升。提高质量并不限于产品和服务，而应是全方位的，还包括基础设施、城市建设、生态环境等方面。因此，应当将质量提升作为新常态下引领发展的主要着力点。三是传统需求仍然具有较大的增长空间。引领新常态，需要处理好新动能与传统动能、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潜力释放之间的关系。四是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性空前提高。五是宏观调控面临的目标更加多元，任务更加复杂，难度也更大。宏观政策必须在保稳定、控风险和促改革、调结构之间取得平衡。六是深化改革对于推动发展仍然具有决定性意义。引领新常态，必须把不失时机地推进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改革作为重中之重，并努力使之取得实质性进展。

黄群慧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新时代发展实体经济的三个思路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近日提出，实体经济从来都是我国发展的根基，新时代实体经济发展的关键是通过创新驱动战略促进实体经济供给质量提升，加快形成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注意的是，中国还不是一个世界性实体经济强国，中国实体经济发展面临着从大到强转变的重大任务，虽然具有庞大的实体经济供给数量，但供给质量不高，无法满足消费结构转型升级的需要，还存在实体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动新时代中国实体经济发展，有三条政策思路：

第一，发展实体经济的核心目的是提高制造业供给体系质量，围绕提高制造业供给体系质量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化解制造业供需结构失衡。第二，发展实体经济的关键任务是形成工业和服务业良性互动、融合共生的关系，化解产业结构失衡，构建创新驱动、效率导向的现代产业体系。第三，发展实体经济的当务之急是坚持“实体经济决定论”，从体制机制上化解“虚实结构失衡”，将风险防范的工作重点转向关注长期系统性经济风险。

（以上均由孙昌岳整理）

本版编辑　欧阳优

中国经济增长呈现新特点

□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张立群

趋势观察

近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可以说，推动高质量发展，不仅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更是遵循经济规律发展的必然要求。那么，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中国经济呈现出哪些新特点？推动高质量发展又将带来哪些新要求？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探讨。

眼下，中国经济开始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运行开始显现新特点，我们不妨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来分析。

首先来看需求。市场需求对供给的要求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消费方面看，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满足后，市场购买活动开始摆脱主要重视数量和价格的特征，开始越来越重视产品或服务的质量、品牌、信誉度、安全、环保等指标。个性化、多元化的消费特点日益突出。从投资方面看，我国城镇化已经度过粗放数量扩张的补课阶段，开始进入以人为中心，科学规划、全面发展、系统提高的新时期。由此带动的投资活动预计将进入总体平稳的状态。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则进入以水平提升为主线的发展时期，重点是提高质量、优化结构，提升在供应链和产业分工中的位置。由此带动的投资活动，预计也将比较平稳。综合分析，投资增长也将呈现总体平稳的特点。从外部环境看，世界经济总体处于生物信息技术革命与下一次技术革命之间的发展平台期，出现高度繁荣的可能性较小。我国出口增速预计总体将保持温和增长，且不排除出现较大波动的可能。综合看，社会总需求将由主要关注数量的快速扩张，转为温和增长。

再看供给。经过长期数量快速扩张，我国物质技术基础已经达到较大规模，多种产品生产能力位居世界前列，对社会总需求的数量保障能力显著提高。供求关系已经从总体供不应求和普遍短缺，转为总体供大于求和相对过剩。供给对需求的不适应，已经从数量保障能力不足转为质量保障能力不足。这一变化必然使需求对供给的要求，从“有没有”转为“好不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点，必然从强调“快和多”转为强调“好和省”。这必然倒逼生产转型、企业转型，从粗放、低水平数量扩张，转向集约型、质量效益型、绿色清洁型发展轨道。提高质量、促进共同富裕成为新时代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主要任务。

综合分析各方面因素，预计2018年国内外市场需求增长比较平稳，将支持经济保持平稳增长；市场化、法制化去产能活动趋向规范，主要产品生产能力较为充裕，供给增长潜力较大。在此基础上，2018年市场总供求总体保持平衡，价格涨幅平稳。预计PPI同比涨幅较2017年有明显下降，CPI同比涨幅在2%左右。预计本年度内经济运行小幅波动、总体平稳；以提质增效、减排降耗为主线的转型升级活动明显增多，新的经济增长特点将不断显现。

面对这一形势，我们要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辩证统一地把握好“稳”和“进”的关系，切实推动我国经济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进展。一方面，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向不变，稳健的货币政策要保持中性，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更好为实体经济服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另一方面，应加快解决制约新型城镇化推进的诸多问题，提高城市群质量，推进大中小城市网络化建设，增强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吸引力和承载力。此外，还要全面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推进基础性关键领域改革取得新的突破，从制度完善上促进“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的落实。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重点在“破”“立”“降”上下功夫。全力推进发展理念、发展方式转变，着力完善体制机制和制度环境，坚忍不拔、持之以恒地推动经济提质增效，稳步迈入高质量发展新时代。